

李运富：重构中国汉字学学科体系

2024-12-11 18:34:42 来源：顶端文博

从传统出发

重构中国汉字学学科体系

李运富

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本文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摘要：以20世纪初为界，汉字研究可以分为传统文字学和现代汉字学。传统文字学已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因兼有其他学科内容而比较繁杂，理论上也存在一些缺陷。现代汉字学受国外语言文字理论影响，往往生搬硬套，无视传统，在汉字性质、汉字起源、汉字发展等关键问题上产生一些不合汉字实际的认知，导致现代汉字学内容贫乏，学术性减弱，学科地位下降。新时代汉字学既不能像传统文字学那样用文字包含语言，也不宜像现代汉字学这样用语言吞没文字，应该立足汉字本体，注重文字与语言的互助互证关系，把形体、结构、职用作作汉字的三维本体属性，继承传统而超越传统，重新建立中国自主的“三维汉字学”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实现学科体系自主化。

关键词：传统文字学；现代汉字学；自主知识；继承超越；三维属性；学科体系

中国的现代学术有三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二是西方理论，三是苏联框架。但这三者没有很好地结合，而是完全西化和苏化，传统基本被否定或忽略，致使现代的中国学术充斥着外国的论调，很少有中国自己的声音。四川大学资深教授曹顺庆将中国现代的这种学术现象称为“失语症”，深刻指出：“中国原有的自主知识体系在近现代以来基本上不被承认，甚至被废除、被遮蔽、被歪曲、被贬低、被边缘化、被遗忘。这是当今中国最严峻的问题，是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为什么会如此？问题的关键在哪里？笔者认为首先在文明观，文明观是一个基础，是各个学科的底座，在这个底座上搭建的各个学科都会受到这个底座的决定性影响。当前，文明观不正确是影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传承与创新的首要问题。文明观问题不解决，各个学科就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失语’现状。……怎样解决这个重大问题？需要学术界下大决心，用大力气，必须‘踏石有印，抓铁留痕’，探索出一套实实在在的理论路径，联合国际学术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从‘重写文明史’进一步拓展到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①我们非常认同曹教授的洞见，因为我所关注的汉字学领域也存在这个问题，也需要克服“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影响，坚持中华文明自信，从传统学术出发，借鉴国外理论方法，进而超越传统，构建属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代汉字学。

一、传统的自主文字学体系

汉字具有悠久的历史，对汉字的研究也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开始，通常被称作“文”“名”“书”“书契”等，秦汉

传统文字学从周宣王时代《史籀篇》算起的话有2000多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中国第一部汉字学专著，其《叙》是中国第一篇汉字学论文，论述了汉字起源、汉字结构、汉字发展、汉字功能、汉字使用与汉字规范等核心母题，成为文字学理论的源泉。《说文》也是一部字典，它首创汉字本义为主、别义为辅的释义体例和“始一终亥”的部首编排法，全面解释9353个小篆的形音义，为历代字典辞书的编纂开启先河。可以说从《说文》开始，中国文字学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就基本建立起来了，后世学者不断阐释和丰富，所以传统文字学是有比较完整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其主要内容和观点可概述如下：

(一)文字的性质和功用

《说文》解析文字的形体、意义和读音，把文字看成“形音义”三位一体的东西，看成“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文化符号。段玉裁总结说，“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说文》“凡篆一字，先训其义，……次释其形，……次释其音，……合三者以完一篆”。③这就奠定了传统文字学对文字属性的认识和以“形音义三要素”为基本内容的学术观念。

所谓“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是对书面语言要素的分解，目的在解读文献。文献的传承和解读首先感知的是文字，所以古人在学术观念上把文字当成解读文献的工具，强调解读文献要从文字开始，通过汉字的形体分析，获得它所对应的语言读音，再根据读音确定文献中具体的词义。如钱大昕《小学考·序》说：“古人之意不传，而文则古今不异，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训，此一贯三之道。”④王筠《说文释例·自序》云：“夫文字之奥，无过形音义三端。而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义为本，而音从之，于是乎有形。后人之识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义，而文之说备。”⑤可见古人考证汉字形、音、义关系的最终目的是求“文之说”。这种认识在古代训诂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了“形音义互求互证”的研究方法，解决了文献阅读中的很多实际问题，对研究字形与语言音义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文字的构造与分析

形体的构造与分析是反向思维，从一方可以推知另一方。先秦就有《左传》“止戈为武”“皿虫为蛊”⑥、《韩非子》“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⑦之类的形义分析字例，到东汉《说文》，已有系统分析汉字形体的方法。一是“**构件功能分析法**”。把一个字形拆分成几个部分(独体字可以不分，也可能再细分为头脚尾等)，说明每个部分的形体在构字中起什么作用，或象形，或表义，或示音，或标记。如“牽”分析为：“引前也。从牛，(𠂔)象引牛之縻也，玄声。”《说文》540个部首理论上都是具有某种功能的构件。二是“**同意类聚法**”。有的构件功能从本字看不明白，但跟另外的一个或几个字中的相同构件构意相同，而这些字并不在同一部首下，许慎会把它们类聚到一起，以起到互证的功能。如分析《羊》部的“美”而说“美与善同意”，分析《言》部的“善”而说“此与義美同意”，分析《苟》部的“苟”而说“从羊，羊与義善美同意”，就是说这些字中都有“羊”这个构件，其构字功能相同，故曰“同意”。三是“**变异溯源法**”。有的形体是另一个字变异来的，就溯源到未变的原形，用原形来说明变形的构形原理。如“世”分析为：“三十年为一世。从卅而曳长之，亦取其声也。”四是“**同形系联法**”。即把字中的某一部分跟另一个熟知的形体联系起来，通过认同而掌握新字中的形体，其形体认同跟功能无关或主要不是关注功能。如“𩚑”分析为：“昆吾圜器也。象形。从大，象其盖也。”⑧把“壶”字的上部跟“大”字联系起来，因为这部分形体的写法跟“大”相同，而它的功能是“象其盖”，跟大小的“大”无关。

(三)文字的归类 and 系统

文献中使用的文字成千上万，逐个认读和研究，会一盘散沙，无法体现规律而总体掌握。所以把文字归纳成类别进而形成系统，是文字学必须要做的基础工作。秦汉时期的识字课本《仓颉篇》《急就篇》等就有简单的系统意识，有些字是按照形义关系进行分类编排的。《说文》把9353个小篆字头分为540部，每部立一个字为部首，“凡某之属皆从某”，就是属于这个部首的所有字都包含着部首形体，意义也跟部首字相关，实际上等于把所有的汉字分成540个类，部首与部首之间“据形系联”，部首之内的属字按意义关系排列，从而形成完整系统。

除部首系统外，《说文》还通过解说体例展示复杂的字词关系。如列举1163个“重文”(籀文、古文、或体等)，说明汉字有异字同用现象；用“一曰”“又曰”“或曰”及“古文以为”等表述，说明汉字有同字异用现象；这些现象涉及后来所谓“异体字、同形字、通假字、同源字、古今字”等关系。

(四)文字的起源与发展

关于文字的起源，古人有结绳记事、契刻记事、伏羲创八卦、仓颉作书契等传说。传说中的人物不是关键，关键是文字的形体从哪儿来。《周易·系辞》说：“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⑨可见伏羲作八卦是取象于客观事物。《说文·叙》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⑩“书契”即文字，也是见“迹”而知分理相别才造文字。后来人们把八卦和书契合起来说，唐司马贞《三皇本纪》：“庖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⑪明赵古则《六书总论》：“六书未作，六书之体散在天地；六书既作，天地之用具于六书。”^⑫“六书”也是指文字。这些说法涉及的文字创造者和时代虽然不同，但文字形体来源于客观事物的观念是一致的。

当然，不可能所有文字都来源于客观物象，这就涉及文字发展问题。《说文·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⑬许慎把文字的发展变化分为四个阶段。先是初期的“依类象形”，即根据事物的共象创造形体，因为这类形体是描摹物体形成的线纹，所以叫做“文”。“其后形声相益”，就是后来根据语言的音义构造形体，因为这类形体是利用现有形体的音义滋生的，象生孩子一样可以繁衍增多，所以叫做“字”。文字一多，可以完整表述事件和语意了，就连缀起来写到竹帛上，写在竹帛上的文字是连缀顺从的，所以叫做“书”。经历五帝三王的世系变化，文字不断“改易殊体”，就变得纷繁复杂了。可见许慎已经认识到文字不是一步就完善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后世学者还从“六书”的顺序来研究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把“指事”“象形”看作文字之源，把“会意”“形声”看作文字发展的结果。

(五)文字学体系

古人所谓“文字学”也叫“小学”，实际上相当于“语言文字之学”，语言与文字不分，捆绑在一起，所以有“形音义”三位一体之说。古人从形、音、义出发，分别建立以《说文》为代表的形体学，以《广韵》为代表的音韵学，以《尔雅》为代表的训诂学，从而奠定了传统文字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如宋人晁公武说：“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衡(横)纵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论体制之书，《说文》之类是也；论训诂之类，《尔雅》《方言》之类是也；论音韵之书，沈约《四声谱》及西域石切字等是也。三者虽各一学，其实皆小学之学。”^⑭这种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文字学体系，是传统文字学的基本框架。

文字学之所以要包容形音义三者，根本原因在于要解读文献。文献由语言组成，语言是音义结合体，而音义依附于字形，文献书面语是形音义一体的。目的决定内容，只要以解读文献为目的，文字学就必然要研究形音义三者。在古代的文献体系如《四库全书》中，研究文字形音义的所谓“小学”书被附在“经部”，是为经学服务的。因为有用，所以传统文字学地位很高。

(六)文字的教学与规范

文字学与文字教学相辅相成。中国向来重视文字教学，也重视文字规范，用于教学的一般是规范的。从先秦的《史籀篇》，到秦汉以后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急就篇》《凡将篇》《训纂篇》《滂喜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都是用韵语编成的识字课本。《说文》分别部居，逐字解释形音义，既能储存文字，研究文字，又有规范文字和教授文字的功能。后世字典如《字林》《玉篇》《类篇》《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等都继承《说文》“形音义”综合说解的模式。这种形音义三合一的字典模式沿用到现代，现代汉字的规范和汉字资源库的建设也以分析汉字形音义为前提。

传统文字学强调对个体汉字的掌握要落实到具体的形、音、义上，所以无论是教还是学都有一种“字典式”可以感知的明确目标，容易操作把握。字典式教学把文字跟语言结合一体，既认识文字的形，又掌握语言的音和义，掌握了字的形音义，就能大致阅读和写作，所以非常实用，在现代的基础教育领域仍然有广泛接受度。

“六书”是古代小学教学的一门课程，以分析讲解文字的形义为中心，相当于现代的“语文”课。宋代以后，教学性质的“六书”变成了学术性质的“六书学”，但“六书”仍然是汉字教学的有效抓手，长期被利用着。

上述可见，传统文字学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从先秦到清代，学者们建立了实用性强、具有系统框架和话语阐释的文字学，这是完全自主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字知识体系。

二、外国语言文字理论的影响

现代对汉字的基本认识并非来自传统学术，而是受外国语言文字理论影响的结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如下几种学说。

(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说：“口语是灵魂内在感受的符号，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①⑦}瑞士学者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①⑧}他们把文字看作口语的符号，也就是记录口语的工具。中国学者接受这种文字工具论后，完全忘记了传统文字学的自主知识，直接导致现代汉字学在内容和体系上产生诸多弊端。

首先是内容贫乏，解释力弱。既然把文字看作语言的工具，文字的价值要靠语言来体现，那文字学就只能依附于语言学。所以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文字学跟语言学分立，文字学只研究“形体”，没有实际内容，因为“音义”划归了语言学。如唐兰说：“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声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严格说起来，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字音是语音的一部分，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①⑨}现代汉字学剔除传统文字学的“义”和“音”以后，就只剩下“形”了，结果古代部分只讲形体演变和“六书”，现代部分只讲汉字简化和规范，汉字学变成了“字形学”。字形学虽然是着眼文字本体的，但只研究“字形”的汉字学难免内容空洞，学无所归，不知研究形体的目的是什么，因而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汉字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许多现象及规律。

例如把文字定义为记录语言的符号，而甲骨文之前的零散符号由于不能成句成段地记录语言就都被排除在文字之外，那么甲骨文从哪儿来的呢？找不到汉字源头，只好照搬西方学者的说法，把汉字的源头定为

记事物事件，使其超越时空传递，以便在不同语言的部落之间或人与神灵之间交流信息、表达思想。因此，原始汉字在职能上是汉语的增补，而不是汉语的记录和代替。不只是原始汉字，现代网络空间也有很多汉字符号并不记录语言音义却能表情达意，如“囧、囧、囧、天”等，用外国的文字定义是无法解释的。

其次是过度简化和规范化。既然文字是工具，就越简单越好，所以现代汉字学把文字改革当作主要内容，特别是简化汉字已成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

适当的文字改革是必要的，汉字发展史本有改革的传统。每当汉字使用出现困难时，人们不是推翻或否定原有系统，而是因势利导，改革改良，使其在基因相承的前提下更加适应时代的需要。如秦代的“书同文”解决的是战国用字混乱问题，采用的方法只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汉时期“隶变”动因是提高书写速度，主要通过变线条为笔画、变圆转为方折等书写技巧来实现。历代也都有简体文字通行，但并不拒绝繁化。很多古文字同时有简体和繁体，甚至由简体发展为繁体，如增加区别符号、装饰符号，增加声符、义符等。汉字发展受区别律和简易律约束，当字形难以区别、表意不明时需要繁化，繁化到影响书写和应用时又需要简化，繁化和简化相互制约，协同发展，以达到优化的效果。所以字形的发展目标是优化，不是一味地繁化或简化。但受“工具论”影响，现代的汉字简化成为运动，出现一些违背学理和规律的简化，特别是《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竟致无法推行。

适当的汉字规范也是必要的，历史上有许多汉字规范的措施和行动。现代的汉字规范对字典编撰和信息处理都有积极作用。但规范应该提出标准，阐明原理，具体材料的规范按标准执行即可。如果对每个汉字都作出独一无二的规定，就等于没有规范标准，实际上是过度规范，没有必要。笔顺、笔画的主要作用在于字典检索，并不影响汉字本身的功能。而检索可以有其他方法，也可以容错多选，所以笔画、笔顺不必规定太死，否则会增加学习难度，消减学习兴趣。

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其实是中国学者自己从外国理论推导出来的，并非外国学者的原意。索绪尔在定义“文字”时明确表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⑩很明显他把汉字排除在他的“文字”定义之外，因为他知道汉字属于“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⑪，“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⑫

汉字不应该是记录汉语口语的“工具”。工具是凭借的东西，是外在独立的，无法跟它涉及的对象融为一体，更不能代替涉及对象；而汉字在表达汉语时却是跟汉语的音义结合为一体的，是可以部分代替汉语的。而且汉字表达汉语也不等于用录音机之类的工具记录汉语，录音机记录的汉语是可以还原的，汉语本身不会有任何变化，而汉字表达的口语往往并非口语的原貌。书面语可以尽量接近口语，但永远不会等于口语。正如李泽厚所说：“中国的文字不是语言的复写。我以为中国的语言学家，从马建忠到王力，都可能犯了错误。他们都用西方的格式来研究中国语言。”^⑬所以与其把汉字看作记录口语的工具，不如把汉字看作不同于口语而可以把口语转换为书面语的“文化符号”。

作为文化符号，汉字既有符号性，也有文化性。汉字本身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可独立成为文化类项。这个文化类项跟其他文化类项的关系非常宽泛灵活，没有固定内容和上位归属，所以属于泛文化。这种泛文化性在汉字符号的各种属性(形体、结构、职用)上都有表现，难怪陈寅恪会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⑭

字体现了图画由繁到简的进化过程。20世纪,美国学者格尔伯《文字的研究》一书发扬了“文字起源于图画说”。但美国学者白瑟拉托的著作《文字之前》对此作了批判,认为瓦尔博顿和格尔伯的理论纯粹是主观推测,并不符合客观事实。^{②5}

“图画而文字”的学说被引进中国后产生很大影响。沈兼士1922年《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指出:“在文字还没有发明以前,用一种粗笨的图画来表现事物的状态,行动,和数量的观念,就叫做文字画(picture writing)。”^{②6}1927年,沈兼士《从古器款识上推导六书以前之文字画》进一步阐述:“盖于六书文字时期之前,应尚有一阶级,为六书文字之导源,今姑定名为‘文字画时期’。‘文字画’之可考见于今者,即钟鼎学家所谓殷商钟鼎中之‘图形’是也。”^{②7}其后,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唐兰《中国文字学》、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等论著都阐述过这一观点,从而形成“图画—文字画—文字”这样一个文字起源的公认模式。

如果“图画”指的是艺术性的绘画或叙事性的连环画,那“汉字”不可能来源于这样的“图画”。中国发现的宁夏“大麦地文化”、河南“贾湖文化”、甘肃“大地湾文化”等,距今都在8000年以上,其中既有象物性很强的类似于“图画”的符号,也有抽象的类似于“文字”的符号,可以说是图文并行,难分先后。国内各地所发现的一些原始岩画,年代大都在“大麦地”“贾湖”等类似于“文字”的符号之后。所以目前还无法根据国内的考古事实建立起“图画—文字画—文字”这样的汉字起源序列。

国外有一些岩画早到一两万年前,似乎是先有图画、后有文字,但国外的岩画并没有演变为文字,已知的几种世界自源文字,没有哪一种被证明是由图画变来的,例如印第安象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西亚楔形文字等,都不是由图画变来的。这些自源文字在初始阶段是有点像图画,但像图画并不等于来源于图画。即使考古发现“图画”早于“文字”,也不能证明“文字”的形体必然源于“图画”,例如“哥哥”早于“弟弟”、“弟弟”也可能像“哥哥”,但“哥哥”并不是“弟弟”的源体或母体,因为“弟弟”不是由“哥哥”产出的。

如前所述,传统文字学认为书画同源,这就跟文字源于图画说不同。书画同源,“书”与“画”是平行的,可以表述为“兄弟”关系;文字源于图画,则意味着先有图画、图画再产生文字,只能表述为“父子”关系。实际上图画和文字各有自己的特点和用途,它们只能互相影响,共同发展,而不能由一方演变为另一方。如果说初创的象形文字是后代笔画文字的来源,后期文字由早期文字演变而来也是常识,但早期文字自身的来源和早期文字作为后期文字的来源是两回事。早期象形文字图画性强是因为它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描摹,而不是来源于另一种已有的图画。“象形字”是没有场景限制的符号,它代表着某一类抽象的意义,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因而属于文字的范畴;“图画”则是具体图像,它依附于特定的实物和背景,再现事物原貌,以写实欣赏为主要目的,因而属于艺术的范畴。书画可以同源而不必相生。

(三)文字由低级向高级分三个阶段发展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从生物进化论引申出文字进化论,^{②8}认为人类文字起源于象形文字,经过表意文字阶段,进入表音文字阶段,而字母拼音是人类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拼音文字是最优秀的文字。这种观点盛行于国外,被总结为世界文字发展“三阶段”规律。尽管不同学者的具体说法不完全相同(或说由词符文字到音节文字再到字母文字),但最后发展为拼音字母文字的结论是一致的。正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汉字作为表意文字被判定为落后文字。20世纪初,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出于强国的目的,检讨中国落后的原因,就认为是汉字落后(难写、难认、难学)导致了民族落后,所以提出要打倒汉字,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道路。

但“三阶段论”实际上是未经证实的“空理论”,世界上的拼音文字大都不是由象形、表意文字自然发展而来,而是借用某种文字经人为改造而成。有的文字一开始创造就是字母拼音的,根本没有经过象形、表意

的“声符”和用字层面的“假借”，往后的发展起起伏伏，很难总体划分阶段。就他源文字而言，多是借用别的文字创制字母而形成拼音文字，如英文等。但像日文，即使借用汉字创造了片假名、平假名，记录日语形成文献时也不完全是拼音，而是同时用训读汉字表意。可见由“象形”到“表意”到“表音”这样的发展规律，不仅不能适用于世界文字的总体，甚至对某些具有拼音性质的文字也是不完全相符的。在这种未经验证的虚假“理论”基础上建立的所有文字学理论和以此“理论”为指导的所有实践，都是靠不住的。那么，根据“三阶段论”判断汉字是劣等文字，当然也是虚妄的。

针对某种自源文字，应该有从草创到成熟再到完善的过程，而不同的文字之间，特别是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之间，尽管有某些属性或某些方面的差异，但就整体功能而言是无所谓优劣的。一种文字只要能为使用该文字的国家或民族接受，能充分表达民族情感和语言音义，能满足国家、社会 and 个人的实际需要，就是适用的好文字。汉字高度适应汉语，汉语的语素基本是单音节的，汉字也是单音节的，两者正好匹配。汉语复音词的产生大都是原有语素的合成，汉字能表达语素就能表达无限的新词，所以无论汉语怎么变化，汉字都可以基本稳定。汉字还能弥补汉语的不足，在书面上区别同音词，在时空上超越语音的变化。而且汉字具有构造理据，无论是根据客观事物描摹出来的原生形体，还是利用已有形体组合出来的孳生形体，都蕴涵着先民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知，这些认知固化在汉字形体中就像基因一样会随着汉字的传承而传承，后人通过对古文字形体结构的理据分析，可以推知古人创制汉字的思维过程及其依存的时代文化，也可以利用汉字的形体理据表达语言音义之外的信息。因此，汉字对于汉语和汉民族来说是最优化的文字。

三、重建新时代汉字学体系

正因为现代汉字学追随外国语言理论，抛弃中国传统文字学的合理因素，把汉字抽离文献使用环境，看作汉语符号的翻版，导致发展进入困境：一方面个体汉字的研究“字典化”“工具化”，缺乏动态活力和理论深度；另一方面去掉“音义”的“字形学”内容贫乏，体系空虚，难以承载数千年积淀的汉字文化。所以汉字学在现代成了没有什么难度，也没有什么用处的学问，学术地位急剧下降，要依附语言学才能存在，沦落成了“语言学的一个分支”。^⑨这种情况跟传统文字学包含语言学的情况完全相反了。

吸收西方理论把文字学跟语言学分立是可以的，文字学不依附于文献解读也是可以的。但既然分立了就不应相互包含，所以在离开文献并与语言分立后，如何根据汉字的使用实际和汉字研究的传统重建文字学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如何在现代的学科体系中找到汉字学的合适位置，值得深入思考。事实证明，完全照搬西方理论是行不通的，要建立中国自主的汉字学知识体系，还是应该从文字学的历史出发，从传统学术中吸取精华。

当然，传统文字学也是有缺陷的。它以服务文献解读为目的，虽然实用而内容庞杂，既要研究汉字的形体和结构，又要研究语言的音义和文献语意，文字学包含了语言学甚至文献学。这种基于书面语“形音义”结合而把文字看作文献解读工具的语言文字学，混淆了语言符号与文字符号的区别，不符合现代文字学与语言学作为两个符号系统分科研究的学术体系。“形音义”三要素说目的在于由文字之“形”，求语言之“音”，以得文献之“义”，所以“形音义”并不在同一平面，逻辑上无法鼎足或并列，而传统文字学的学术构架却是形制、音韵、训诂三足鼎立的。而且并非每个汉字都“形音义”俱全，有些汉字可以只表音或者只表义，既可或缺，就不能称为“要素”。所以梁东汉说：“过去一般文字学家都把形、音、义看作‘文字的三要素’，认为任何一个字都必须具备这三个要素，否则它就不是文字。这种‘三要素论’是不科学的，它在某种条件下可以成立，但是当某一个字只代表音的一个音节时，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⑩而当一个字根本不代表语言的音义而只是

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⑳“夫国……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㉑郭沫若也说：“中国的史料，中国的文字，中国人的传统生活，只有中国人自身才能更贴切的接近。……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㉒

那么，如何才能建构中国自主的汉字学理论体系呢？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民族性”时提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正是汉字学研究走好中国道路、做出中国特色、形成中国风格、彰显中国气派的基本原则。我们要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字学研究的优长，摆脱基于字母文字提出的西方文字理论的束缚，立足汉字本体和汉字发展演变实际，重建新时代中国自主的汉字学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

(一)汉字本体的三个维度

如前所述，传统文字学注重实用而内容庞杂，现代汉字学追求形式而内容空洞，所以至今“汉字学”没有一个符合学理的独立而又完整的体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在于拿掉了“形音义”的“音、义”，而在于对“汉字”的本体属性缺乏正确的认识。^㉓

排除“音义”的“形”当然是汉字的本体，但“形”的所指要明确区分，否则汉字学的立足点就不稳固，许多理论问题说不清楚。不少学者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主张汉字的“形”应该细分为字体和结构两个方面，如王力指出：“关于字形，应该分为两方面来看：第一是字体的变迁；第二是字式的变迁。字体是文字的笔画姿态，字式是文字的结构方式，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㉔王宁创建“汉字构形学”，^㉕明确区分“异写字”和“异构字”，也体现了“形体”和“结构”不能混同的思想。但学者们把形体和结构区别开来，目的大都是为了“分类”，并非把“形体”和“结构”作为汉字的不同属性看待，因而很少建立起不同的系统。我们认为汉字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不是同一系统中的类别问题，而是不同视角的认知问题，它们反映了汉字的不同属性，因而属于不同的学术系统。如果汉字学包含形体和结构两个互有联系而又各自分立的学术系统，那其内容自然就丰富一些。

但这还很不够，完整的汉字学除了“形体”和“结构”，还应该研究其表达功能，也就是“职用”，包括职能和使用。汉字的“职用”不等于传统文字学中的“音、义”。汉字与语言的“音义”确实密切相关，但从汉字本体出发的研究的应该是“字”与“音义”的关系，而不是语言层面的“音”“义”本身，更不是语音系统和词义系统。“字”与“音义”的关系是双向的，甚至是多方交错的，包括文献中客观存在的各种字词关系、字际关系和词际关系。汉字的“职用”还有超语符的，就是可以不记录语言层面的音义，而直接通过汉字形体的离散变异、排序组合等手段实现表情达意的功能。如用“正”字的笔画代表数词，用“吕”字的两个构件表示口对口接吻，用“大”字的外形譬况人的睡姿，把“酒”字的三点水加粗放大表示酒里掺水太多等。^㉖

语言的“音义”不属于汉字要素，而表达“音义”的职能以及与“音义”无关的超语符职能，还有语言的用字现象等，都应该属于汉字的研究范畴，所以汉字“职用”也是汉字本体的属性之一。我们在理论上不赞成传统的“汉字三要素”说，而重新从外形、结构和职用三个不同角度来认识汉字的属性，称为“汉字的三维属性”。这种属性认知，跟汉字使用者对汉字的感知和理解是一致的。我们日常所说的“字”要么指外形，如“这个字写得很漂亮”；要么指结构，如“泪是个会意字”；要么指职用，如“泪和淚是一个字”。可见“字”的含义所指实有三个，正好跟我们所说的“汉字三维属性”相合，因而“形体、结构、职用”这三维属性都是汉字的“本体”。

(二)汉字学的三个分支

既然汉字具有形体、结构、职用三个方面的本体属性，那么研究汉字也应该从这三个维度进行，分别研究

着眼，研究汉字的构形理据和构形规律，包括构形单位、构件类别、构形理据、组合模式以及各种构形属性的变化等。汉字职用学从使用功能的角度，研究怎样用汉字来表达汉语，包括表达单位、表达方式、使用属性、字词对应关系、同功能字际关系等。^{③⑨}

汉字形体学、汉字结构学、汉字职用学这三个学术系统不是并列的，也不是层叠的，而是同一立体物的不同侧面，有些内容彼此关联，有些材料可以多属。理论上三个平面各自分立，具体问题应该放到相应平面讨论，而研究对象的统一和材料的多属共联，使它们形成三维的一体，分立而不分离。这样从认识汉字本体的三维属性出发，分别研究汉字的形体、结构、职用，形成互有联系而各自独立的三个学术平面，从不同角度共同构建起综合的立体式汉字学新体系，我们称其为“三维汉字学”或“三平面汉字学”。

(三)汉字职用学的地位

“三维汉字学”得以形成的关键是增加了“汉字职用”这个平面。我们认为，“汉字职用”不仅属于汉字学的本体，而且应该成为汉字学的研究重点。

一种事物可以具有多方面的本体属性，但各种属性的地位和价值不一定等同。以前的文字学重视形体、结构，有人把形体结构看作汉字的本质属性。其实，从不同角度考察的多种属性，往往很难确定谁是本质谁是非本质，所以汉字的定性存在很多争议。在不否定其他属性的前提下，论证谁更重要还是可以的。如果说重要的就是本质的，那汉字的本质属性应该是职用而不是形体结构，因为形体结构是自然属性，而职用是社会属性。站在人文学科的角度，社会属性应该更受重视。正如“人”和“建筑物”也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我们平时更关注人的社会关系和建筑物的使用功能。汉字的职用属性应该成为研究重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对文字来说，形体结构本身有时很难跟别的符号(例如图画、标记)区别，只有创造符号的目的和实际功用才能将文字与非文字区别开来。在文字内部，不同的文字之间，主要的差异或特点也不是形体结构，而是职用。例如汉字跟东巴文在形体和结构上有很多相同相通的地方，但每个符号所表示的功能并不相同，所以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字符号。同种文字的不同字符之间，根本性的差异仍然不是自然性的外形或结构，而是反映造字目的和体现实际功能的职用，所以同样的字形可以根据职用差异区分为不同的字(同形字)，形体不同的字样如果功能相同也可以归纳为同一个字(异体字)。而且对具体“字”的命名和指称，一般也是选取功用的角度，如“人”字会说成“rén字”，而不说“一撇一捺字”。可见从学理上来说，形体的“字”、结构的“字”只是分析字料时对属性的指称，不是作为符号使用的“字”，只有带着实际功能的职用“字”，才有符号意义上的个体称谓。那么能够区别个体符号的职用当然应该是汉字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是相对更重要的属性。

其次，人们学习和研究汉字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写字和分析字，而是为了用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理解别人用字表达的思想。汉字作为一种符号，形体是其存在形式，职用才是它的价值体现，而结构只是联系“体”与“用”的“中介”。学习和研究汉字重要的是掌握其社会性的职用，而不宜把主要精力花在自然性的字形和结构上。在某种条件下(例如会打字)，字形不会书写没有关系，结构理据不会分析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不知道某个字可以怎么用、应该怎么理解，那就等于没有学会这个字。

第三，从汉字的研究实践看，虽然文字学史多讲“字体”演变和“结构”分析，没有明确把“职用”当作汉字的本体，但实际上汉字研究始终没有离开职用，甚至可以说，“职用”才是学者们真正关注的重点。如《说文解字》被看作研究“形制”的代表，而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形体分析证明汉字的本用职能，同时用“古文以为某”的方式揭示文献中的借用现象，用“重文”体例归纳异字同用现象，用“一日”体例反映同字异用现象，此外还有不少书证立例，可见许慎的目的始终着眼于“用”的。压由上十量的字典辞书，体注笔迹，学术笔记，字词

(四)三维汉字学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三维汉字学”是以认识“汉字的三维属性”为基础的。“三维属性”不是对传统“三要素”的简单分合，而是有着本质差异的两种学术思路。“三要素”的“三位一体”是虚假的，实际上“形”属文字系统，“音义”属语言系统，两者是分离的，语言系统的“音义”结合体也被分离为“音”和“义”，所以它们的关系是“形-(音-义)”，以此为依据建立起来的传统“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属于不同的学科；现代的“文字学”只有“形”，没有“音”“义”，而单个汉字仍强调“形、音、义”，结果单字要素的分析跟学科体系内容不对应。“三维属性”则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形体、结构、职用三者分立而不分离，所以它们的关系是“形+构+用”，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汉字形体学”“汉字结构学”“汉字职用学”都属于“汉字学”，是立足于汉字本体而形成的分立而不分离的三维学术体系。这种“三维汉字学”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应用价值。

第一，三维汉字学突破了传统跨学科的庞杂文字学体系和虽属本体但片面薄弱的现代汉字学体系，既立足本体，又全面周到，从而完善了汉字学体系、丰富了汉字学内容。

第二，三维汉字学保证了单个汉字的属性分析跟学科体系的平面建设的一致性，并且主张把汉字的材料分析和各种具体问题的讨论分别放到相应平面的学术系统中进行，从而避免把不同平面的东西搅和到一个平面而引起的种种争议，大大提高了汉字学理论的解释力。例如关于汉字的性质，长期聚讼纷纭，其原因就在于片面地看问题。如果从汉字的“形体、结构、功用”三个平面分别观察，则可以统一认识：在形体方面，汉字属二维方块型；在结构方面，汉字以表意构件为主而兼用示音和记号构件；在功用方面，汉字主要记录音节(含语素音节和纯音节)，也可超语符直接表意。这样，说汉字是“方块文字”可以，说汉字是“表意文字”可以，说汉字是“音节文字”也可以，综合起来，说“汉字是用表意构件兼及示音和记号构件组构单字以记录汉语语素和音节并且可以超语符表达信息的平面方块型符号系统”也行，何必偏执一隅而是此非彼！^{④0}

第三，三维汉字学摆脱了汉字必须记录汉语的认识，把只要具有形、构、用属性并且没有时空限制的表意符号都纳入汉字考察范围，较好地解决了史前文字与有史文字的联系，对汉字起源问题的解释更合情理。争论汉字起源，首先应界定“汉字”的内涵和“起源”的具体所指。不同属性的“源”是不同的。如汉字形体的来源，我们不同意“汉字起源于图画”说，而支持“书画同源”，即书画都源自对客观事物的描摹，书画的本质区别不在形体而在职用。就汉字的“源头”而言，我们认为具备“形、构、用”三维属性的字符早在距今8000年左右就已出现，汉字跟汉语的结合是逐步完善的。^{④1}

第四，三维汉字学中的“汉字职用学”开辟了汉字学新的研究方向，健全了汉字发展史研究的框架。汉字学研究长期忽略汉字的职用，讲汉字发展史一般也只讲形体的演变，很少讲汉字结构的演变，汉字职用的演变更是空白。我们认为，“汉字形、意、用的演变不可能全都同步进行，合在一起叙述有时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关于汉字的演变研究最好也要分为字形的演变、字构的演变、字用的演变三个系统来进行”。^{④2}特别是汉字职用演变史应该是汉字发展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离开汉字职用演变史就不成其为完整的汉字发展史。汉字职用演变史的梳理将打破传统汉字发展史研究的瓶颈，突破汉字发展史即字体演变史的误区，引起汉字发展史研究框架、论证思路的体系性变革，从而重构三维式的完整的汉字发展史。

第五，三维汉字学不仅完善了汉字学自身的体系建设，同时也找到了所有文字共有的属性范畴，从而破解了不同文字间差异比较难题，为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做出了贡献。共有属性范畴的比较才是有效比较，通过有效比较才能显示特点。例如汉字跟英文比，外形上汉字呈“平面方块型”，英文属“线型”；结构上汉字以“表意”构件为主，英文以“表音构件”为主；职用上汉字表达汉语的“音节”，字跟词(语素)不——对应，英文记录英语的“词”，字跟词基本一致，这样按不同属性分别比较和描述，就清晰明白，^{④3}而且可以照各种

第六，三维汉字学，特别是其中的“汉字职用学”理论，可被广泛应用于汉字本体研究之外的其他领域，如疑难字词考释、古籍整理、字书编纂、汉字教学、汉字规范及其他文字的研究等。相关成果已陆续出现，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四、结语

传统文字学虽有缺陷，仍是中国学术的立足根基；外国语言文字理论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切忌生搬硬套。我们应该像曹顺庆教授倡导的那样，从传统出发，坚持中华文化自信，重塑文明观，重写文明史，在此基础上重建各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汉字学而言，既不能像传统文字学那样用文字包含语言，也不宜像现代汉字学这样用语言吞没文字，应该立足汉字本体，注重文字与语言的互助互证关系，从汉字的形体、结构、职用三个维度重建立体式新型汉字学体系，尤其要继承传统文字学的实用特点，高度重视“汉字职用学”。我们相信，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自主性汉字学体系“三维汉字学”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有影响，汉字学的学科地位也会越来越高，越来越独立。